

# W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William Julius Wilson

# 当工作消失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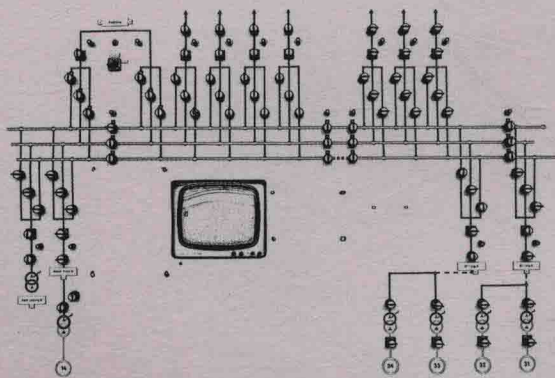
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美]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著

成伯清 王佳鹏 译

##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 当工作消失时

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美]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著

成伯清 王佳鹏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工作消失时:城市新穷人的世界/(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著;成伯清,王佳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ISBN 978-7-208-14062-2

I. ①当… II. ①威… ②成… ③王… III. ①城市-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IV. ①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172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胡枫

### 当工作消失时

——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著

成伯清 王佳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25 插页 4 字数 284,000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62-2/C·523

定价 52.00元

都 市 文 化 研 究 译 丛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丛书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编委会

主编

孙逊

编委

薛毅（执行）刘北成

成伯清 陈恒 林鹤

胡大平 倪伟 詹丹

## 出版说明

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它与文化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放眼世界，取得新的突破，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为达到此目的，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很紧迫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的自主和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策划了大型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总之，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作品，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2007 年 3 月

献给贝弗莉<sup>①</sup>

---

<sup>①</sup> 指作者的妻子贝弗莉·安·休伯纳(Beverly Ann Huebner)。——译者注

# 致 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个人和机构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詹尼弗·霍克希尔德(Jennifer Hochschild)、爱丽丝·奥康纳(Alice O'Connor)、谢尔登·丹齐格(Sheldon Danziger)、特蕾西·米尔斯(Tracey Meares)、詹姆斯·昆恩(James Quane)和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全部初稿，并提供了详细的评注，包括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它们促使我对本书的不少部分进行重大修改。布伦达·史密斯(Brenda Smith)仔细地阅读了第四章，也提供了有益的评注。我要感谢克诺夫(Knopf)公司的责任编辑维多利亚·威尔逊(Victoria Wilson)，她第一个使我意识到，在有些政策建议上，我必须另辟蹊径；她还帮助我提高了初稿的连贯性。苏珊·艾伦(Susan Allen)以她高超的编辑技巧，极大地帮助我提高了书稿对于一般读者的可读性。最后，我要感谢我在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秘书杰基·哈里斯(Jackie Harris)，他非常细心地校对了全部初稿；感谢艾伦·希考克-沃尔(Ellen J.Hickok-Wall)在定稿的修改和重新编排上所提供的有益的编辑建议。

跟我一道为分析而建立了复杂数据集的研究助理们，尤为值得认可。我先要特别提到以下几位：负责处理源自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UPFLS)的民族志数据和开放式访谈的索菲娅·派德(Sophia Pedder)、负责同样资料外加UPFLS雇主调查的罗威娜·亚伯拉罕(Rowena Abrahams)，以及负责雇主调查的桑德拉·史密斯(Sandra



Smith)。他们三位在分析、组织和解释复杂的数据集上，展示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奉献精神。我也要感谢卢瓦克·华康德(Loïc J.D. Waquant)在 UPFLS 调查分析中所提供的帮助；感谢阿米特·赛瓦克(Amit Sevak)、琴·特文格(Jean Twenge)和西蒙·韦费尔(Simon Weffer)在 UPFLS 的民族志资料、开放式访谈和雇主调查方面的工作；感谢庄凯莉(Kelly Chong)在参考文献编排上的协助工作；感谢杰弗瑞·莫雷诺夫(Jeffrey Morebnoff)在绘制芝加哥社区区域地图上的工作。本书也受益于布鲁斯·兰金(Bruce Rankin)所提供的帮助，他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者。兰金跟我一起分析了我所主持的三项研究的全部数据，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三项研究：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伍德朗(Woodlawn)和奥克兰(Oakland)两个居民点研究，以及有关高风险居民点对青少年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

芝加哥大学的许多教师和学生为这三项研究的资料收集付出了努力。城市贫困和家庭生活研究包括了一支庞大的研究团队。这个项目由罗伯特·阿庞特(Robert Aponte)管理执行。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师雷蒙·史密斯(Raymond Smith)和理查德·陶布(Richard Taub)负责指导民族志小组的研究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南·阿斯顿(Nan Astone)、丹尼尔·布雷斯劳(Daniel Breslau)、梅泽·科尔曼(Major Coleman)、卡伦·弗雷尔(Karen Freel)、安东尼娅·古铁雷斯-马奎斯(Antonia Gutierrez-Marquez)、莎伦·希特斯-巴特莱特(Sharon Hicks-Bartlett)、玛丽莲·柯劳格(Marilyn Krogh)、罗伯特·莱斯特(Robert Laseter)、瓜达罗佩·罗德里格斯-戈麦斯(Guadalupe Rodriguez-Gomez)、玛莎·范·赫茨玛(Martha Van Haitsma)和丹尼尔·沃尔克(Daniel Wolk)。雷蒙·史密斯还负责指导从事内城区居民开放式调查的一组研究助理的工作，这个群体包括梅泽·科尔曼、金铭(Ming Chin)、乔琳·基尔申曼(Joleen Kirschenman)、马修·劳森(Matthew Lawson)、帕特里夏·波特(Patricia Porter)、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玛莎·范·赫茨玛和卢瓦克·华康德。马克·泰斯塔

(Mark Testa)和玛尔塔·廷达(Marta Tienda)二位芝加哥大学教师,负责指导 UPFLS 的大型封闭式调查的数据收集。其他参与这一调查的教师有唐娜·富兰克林(Donna Franklin)、德洛莉丝·诺顿(Delores Norton)和迈克尔·索欣(Michael Sosin)。我也非常感谢参与这一大型调查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员工,他们是萨米尔·亚伯拉罕(Sameer Abraham)、维吉尼亚·巴洛特(Virginia Barrot)、芭芭拉·坎贝尔(Barbara Campbell)、马丁·弗兰克尔(Martin Frankel)、玛丽·奥布莱恩(Mary O'Brien)和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使用封闭式问卷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中的雇主调查,受益于乔琳·基尔申曼和凯瑟琳·内克曼(Kathryn Neckerman)的领导才干,他们同我、华康德、丹尼尔·布雷斯劳和罗莉·斯帕罗(Lori Sparzo)一道完成了问卷的设计,他们还同布雷斯劳、华康德、斯帕罗和朱迪·明茨(Judy Mintz)一起进行了实际的访谈。

伍德朗和奥克兰两个居民点的研究,由戴维·坎贝尔·莉娜(David Campbell Lena)和伦德格伦-加瓦拉斯(Lundgren-Gaveras)负责指导。这项研究也受益于詹姆斯·昆恩和布鲁斯·兰金的工作以及研究助理米妮安·摩尔(Mignon Moore)不懈的努力。艾丽西亚·巴苏克(Alicia Bassuk)和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也在这个项目中担任了研究助理。罗伯特·莱斯特巧妙地组织了伍德朗和奥克兰两个居民点的焦点小组讨论;这两个居民点的调查数据,则由芝加哥市信息中心收集,这是一家私营的非营利研究机构,由加斯·泰勒(Garth Taylor)领导。

有关高风险地区居民点对青少年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包含了芝加哥大学两位教师迈克尔·索欣和罗伯特·桑普森以及这一研究的项目合作者乔琳·基尔申曼的工作和指导。玛丽莲·柯劳格和布鲁斯·兰金担任了这个项目的数据分析员,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etesh)和戴维·莱因戈尔德(David Reingold)作为研究助理参与了这一项目。威廉·麦克里迪(William McCready)及其来自北伊利诺伊大学调查研究

中心的同事，完成了这项研究中的面对面访谈工作。

下述机构为这三项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得到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公司、乔伊斯基金会、斯宾塞基金会、威廉·T·格兰特基金会、劳埃德·A·弗赖伊基金会、伍兹慈善基金会、芝加哥社区信托基金会、贫困研究所及卫生和福利部的支持。伍德朗和奥克兰两个居民点研究之成为可能，端赖于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家庭国际组织对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慷慨资助。所有这些基金会，外加一笔来自高风险地区成功青少年麦克阿瑟研究项目的资助，支持了有关高风险地区居民点对青少年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

我还要感谢法美基金会(the 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其所提供的研究基金，使我得以在法国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实践研究院度过1989—1990学术年度。在这一年里，我访问了多个欧洲国家，并观察和研究了它们的种族、贫困和失业问题。由此获得的认识，都体现在第六和第八章，在那里我对欧洲和美国进行了比较。

最后，谨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

W.J.W.

## 目录

致谢/1

导言/1

### 第一部分 城市新贫困

第一章 从制度聚居区到失业聚居区/15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与脆弱的聚居区/41

第三章 聚居区行为模式与机会结构/68

第四章 内城区家庭的衰落/105

第五章 种族的意义和重要性：雇主与内城区雇员/129

### 第二部分 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第六章 美国有关贫困与福利的信念体系/171

第七章 种族对立和基于种族的社会政策/208

第八章 更广阔的视野：跨民族视角下的社会政策选择/233

附录 A 有关贫困集中化的观点/267

附录 B 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方法论说明/271

附录 C 有关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的数据/278

参考文献/281

索引/306

译者说明/323

# 导 言

在 20 世纪，许多市中心聚居区首次出现了绝大多数成年人无所事事的状况。工作的消失，不仅对个人、家庭和居民点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内城区的失业虽然问题严重，但当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贫困及其后果上时，这个问题又经常遭到忽视或者遮蔽。尽管自 1970 年以来贫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内城区总是以高贫困率而著称，但在有些居民点，目前的失业水平实属前所未有的。

居民点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居民点高贫困率带来的后果，更具破坏性。一个虽然贫穷但都有工作的居民点，截然不同于一个既贫穷又没有工作的居民点。根本而言，如今市中心聚居区的诸多问题——犯罪、家庭破裂、福利、社会组织水平低下等等——都是工作消失的一种后果。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工作的消失？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展开的公共争论，并不是特别地富有成效，因为这种争论总在寻求谴责的对象，而不是去认识和应对使许多美国人陷入经济困境的复杂多变的现实。而且，针对这类问题的解释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经常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

这样一来，那些赞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往往强调包括种族在内的社会结构因素。所谓社会结构，我是指社会位置(或者地位)的定序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它们都基于社会中相互依存的制度(经济、政

治、家庭，教育)安排。种族，既反映了个体的社会位置(在根据肤色界定的社会地位的意义上)又反映了社会关系网络，所以是一个社会结构变量。许多有关社会不平等的自由主义解释，只提到种族，排除掉其他的结构变量。

那些赞成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在解释群体的不同体验、行为和结果的时候，往往强调价值观念、态度、习惯和风格的重要性。根据这种观点，群体差异都反映在文化之中。按照一个人所属的文化来行动，就是遵循一个人的性情倾向来行动，这种性情倾向是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或者认同的共同体中向其他成员学习或者受其影响而形成的。

本书就是试图证明，在理解内城区穷人的失业和其他经历时，社会结构因素是重要的，但也有很多此类因素并不能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尽管种族在内城区黑人的社会状况中显然属于一个重要变量，但对于种族的含义和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文化因素确实起到作用，但对于内城区失业和贫困的任何充分的解释，都应当考虑到其他的变量。社会心理的因素——在目前的争论中，这类因素一般都无人提及——必须与社会结构变量和文化变量整合起来。我们需要一种包含了所有主要变量的广阔视野，而且尤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揭示出它们在决定内城区居民的经历和生活机会上的相对重要性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正是这种视野，指导着我在以下各章的解释和对相关研究的整合。

为了让公众和社会政策争论了解到更多事实，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问题上。作为社会科学家所呼吁的，大多与我们研究的终极面目密切相关。欲图阐明事实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研究者，往往将焦点聚集在一个共同体的问题而不是优点之上。他们的目的就是激发思考，这样，决策者、相关市民、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就能有一个基础来理解此类问题和体会到解决它们的必要性。考虑到有关遗传天赋的重要性的讨论一再出现，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就必须站出来，为了公共政策的目

的，强调社会环境在塑造内城聚居区居民的生活经历上的强大而复杂的作用。

自《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在1994年末出版以来，一种遗传学的观点一再出现在有关内城区居民的苦难的公共讨论之中。由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所著的这本受到争议的书，认为无论社会、经济或族群背景如何，低智商是我们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源由。赫恩斯坦和穆雷试图证明，可以根据智力测验来测量的“认知能力”，不仅能够有力地预测收入，而且还能预测大量的其他结果，从为人父母的能力一直到犯罪行为。《钟型曲线》质疑环境对于群体的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怀疑干预计划能否补偿遗传天赋的缺陷。

譬如，赫恩斯坦和穆雷认为，对于“底层阶级”儿童的早期干预计划希望不大。何以如此呢？因为在学前计划中所得到的标准测试分数上的明显提高，在儿童离开这个计划以后就迅速减退。他们指出，在若干年内，参加过“领先计划”(Head Start program)的儿童的测试分数，与没有参加过的儿童的分数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在学校一年级经常可以获得的认知增益，到三年级往往就已减退，”他们写道，“到六年级，在总体统计上就已消失殆尽。”这就是所谓的“渐趋衰退”(fade-out)：“参加计划的儿童与可以比较的没有参加的儿童在测试分数上的渐趋一致。”<sup>[1]</sup>两位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诸如“领先计划”之类的外在干预计划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它们并未解决认知能力低下所带来的问题。

任何熟悉内城聚居区严酷环境的人，不对有关“领先计划”的效果渐趋衰退的研究结论感到吃惊。倘若从“领先计划”中所获得的进步在这种环境中还能得到保持，那才令人奇怪呢。内城聚居区的儿童必须与条件恶劣的公立学校斗争，这类学校课程乏味，教室拥挤，设施不足，只有极少数教师对他们的学生怀有信心，期望他们能够学点东西。<sup>[2]</sup>内城聚居区的儿童所由成长的居民点，情况同样恶劣，失业率

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而这又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它们都不利于健康的儿童发展或智力开发。除此之外，还有破裂的家庭，反社会的行为，局限于聚居区环境之内的社会网络，对于居民点中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和活动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缺乏。

如果像“领先计划”之类的丰富和强化项目，能够延展和贯穿到小学、初中乃至高中，那么最初的进步很有可能得到保持。而在没有这种计划的情况下，把这些儿童的学业失败或他们毕业以后就业上的不成功归结于他们的“认知能力”，就缺乏根据，在理论上也是不负责任。此外，绝大多数遗传学家都同意，就目前而言，在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

事实上，赫恩斯坦和穆雷作为先天认知能力的一个指标而使用的测验，即武装部队资格测验(Armed Forces Qualifications Test, AFQT)，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成就测验，而非遗传天赋的测验。其中反映了贫困和种族经历的累积性影响。<sup>[3]</sup>近期的研究表明，学校教育和工作经历的额外年数，导致了AFQT分数的显著改变。<sup>[4]</sup>赫恩斯坦和穆雷声称，他们使用家庭背景指标(双亲的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家庭收入)——这个指标在青年参加AFQT测验时(在15到23岁)加以测量——控制了环境经历的影响。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指出的，这种测量并未捕捉到15到23年的累积性环境影响，包括生活在特定居民点的长期效应、文化背景、学校教育的质量、父母的抚育、他们能够花费在或者传递给他们孩子的资源等等。<sup>[5]</sup>

如果说聚居区环境的重要性在诸如《钟型曲线》之类的研究中被低估了，那么，那些自称在“捍卫”内城区居民，并力图校正对于他们行为和经历的歪曲性描述的学者，也对此轻描淡写。这种倾向的早期提倡者是一群美国黑人学者，他们在1970年代对《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的理由》(*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一书中对聚居区黑人的坦率描绘感到怒不可遏，群起而攻之。该书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65年撰写的关于黑



人家庭的富有争议的报告。<sup>[6]</sup>

莫伊尼汉报告中对于聚居区居民点中存在的社会病态的强调，受到这群学者的猛烈批判，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描绘可能让人难堪，也是因为这种强调同他们的主张相冲突：在他们看来，黑人正在形成一种共同体权力基础，而这可能成为美国社会中一股主要力量。他们认为，这一权力基础反映了黑人共同体的力量和活力。这群美国黑人学者强调黑人体验中的积极方面。事实上，聚居区行为的某些方面，在1960年代晚期有关内城区研究中被描绘为是病态的，到了这种新解释中，就被视为是功能性的了，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内城区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家庭，是富有活力的，能够在一种种族主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甚至还走向繁荣。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把关注的焦点从种族孤立和经济上的阶级屈从，转向了内城区黑人的成就。<sup>[7]</sup>总之，就如在《钟型曲线》中一样，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内城区环境的毁灭性效应，就这样要么被忽视了，要么被轻描淡写了，要么就被否定了。

近期最为突出的“饱含同情心的”对于内城区居民的描绘——这种描绘也把焦点从聚居区环境上转移开来——是由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呈现的。<sup>[8]</sup>在一本名为《斯利姆的餐桌》(*Slim's Table*)的书中，邓奈尔报告了自己对一小群工人阶级男人的深度访谈，这些人来自芝加哥市南区一个内城区居民点，其中有一个男子名叫“斯利姆”。这些男人经常光顾邻近富裕的海德公园居民点的一家自助餐馆，访谈也是在这家餐馆进行的。邓奈尔认为，社会学家和新闻记者们忽略了像斯利姆这样的人，他们继续生活在聚居区。为反对我在《真正的穷人》中提出的观点，邓奈尔指出，即便是在最为混乱的居民点，依然可以发现勤奋工作和关心家庭的人，他们信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真正的穷人》中的观点与此并无矛盾。<sup>[9]</sup>我只是指出，无论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黑人——他们在历史上都曾强化过内城区的工作、家庭和教育的传统模式——都纷纷离开许多聚居区居民点，而且数量庞